



龚育之、彭明、张静如的  
中共历史研究路径

欧阳奇 著

GONGYUZH  
PENGMI  
ZHANGJINGRU  
DE  
ZHONGGONG LISHI  
YANJIU LUJING



人  
民  
出  
社

# 龚育之、彭明、张静如的 中共历史研究路径

欧阳奇 著

GONGYUZH  
PENGMI  
ZHANGJINGRU  
DE  
ZHONGGONG LISHI  
YANJIU LUJING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徐 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育之、彭明、张静如的中共历史研究路径/欧阳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01-017429-7

I. ①龚… II. ①欧… III. ①龚育之(1929—2007)—人物研究②彭明  
(1924—2008)—人物研究③张静如—人物研究④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3922 号

## 龚育之、彭明、张静如的中共历史研究路径

GONGYUZHONG PENGMIN ZHANGJINGRU DE ZHONGGONG LISHI YANJIU LUJING

欧阳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7429-7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龚育之的中共历史研究路径	12
第一节 分析和存留重要史料	12
第二节 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
第三节 探索研究思路和方法	40
第四节 开创文献研究新局面	59
第五节 忘我治史的为学风范	69
第六节 学术轨迹综述	75
第二章 彭明的中共历史研究路径	85
第一节 开垦专史研究的新领域	85
第二节 参与史书的大型编修	106
第三节 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120
第四节 一以贯之的探史特征	135
第五节 学术人生小结	148
第三章 张静如的中共历史研究路径	159
第一节 考察党史党建专题	159
第二节 构建党史学基础理论	197
第三节 普及党史研究成果	215

第四节	关注研究队伍建设·····	230
第五节	推陈出新的探史风格·····	239
第六节	研究历程概述·····	249
第四章	三人研究路径的异同·····	261
第一节	研究路径之同·····	261
第二节	研究路径之异·····	271
第三节	研究路径异同的启示·····	280
结    语	·····	285
参考文献	·····	288

# 绪 论

“路径”，亦作“路迳”。意为道路，达到目的地的线路以及办事的门路和方法等。历史上对这一词的使用，较早见于朱熹与弟子问答语录汇编——《朱子语类》。而国外对这一词语(PATHS)的广泛运用，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指在计算机Photoshop画图工具中“使用贝赛尔曲线所构成的一段闭合或者开放的曲线段”。学界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采用“研究路径”一词，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考察研究对象。尤其是在人物研究中，这一方法的大量采用，开阔了研究视野，扩大了研究范围，使“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人物本身，而是转向与人物相连的历史：由人看事，以此观彼，知人论世”<sup>①</sup>。本书亦借鉴这一视角，以史家龚育之、彭明、张静如为个案，论述中共历史研究路径，探寻与其路径相连的学术流派、社会存在、历史发展等内容，从而实现微观至宏观的跨越。

## 一、梳理党史学史的学科意义

历史学中向来重视考察史学史。最早提出“史学史”概念的梁启超就曾说道：“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种系统，终未由明了。”<sup>②</sup>在他看来，“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

<sup>①</sup> 张太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路径》，《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

<sup>②</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4页。

度。”<sup>①</sup>正如梁启超所阐述的,史学史之所以在历史学中处于重要位置,在于它能给历史学家提供一个认识学科发展历程的整体框架,也有助于他们了解学术思想的发展渊源和历史沿革、最新概况等等。可以说,对史学史的初步了解,是任何历史研究者真正进入学科角色的必要知识储备;对史学史的普遍关注,对于学术界避免简单重复研究、净化袭剽日盛风气、推进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将党史学科性质复归历史学的张静如,在党史学中较早强调研究党史学史之必要。他将研究党史学史的重要意义归纳为:“第一,通过对党史学发展过程的回顾与总结,使党史学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第二,全面继承前人的党史研究成果,借鉴其治学经验,循其途径尽快地使党史研究进入前沿阵地;第三,分析在历史上影响党史学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寻找出发扬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的方法和途径;第四,认识党史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辨析其与同源学科、非同源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总之,只有对党史学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才能了解过去,说明现在,预测未来,促进党史学的蓬勃发展。”<sup>②</sup>鉴于党史学史的重要意义,张静如进一步指出,党史学史应该成为党史学者的必修课,不必人人都去研究学术史,但是任何党史工作者都应该掌握、熟悉学科的发展史。

史学史实质上是一门反省式的学科。历史研究者常说,察古是为了知今,述往是为了思来。那么,他们应该能深切体会到梳理自身研究历程之重要。作为中国史学史下面的现代史学史的一个分支,党史学史也不例外。只有立足现实,回顾以往,思考未来,学术进步才有实现可能,赶超前人才能为期不远。考察龚育之和彭明、张静如的史学研究路径,是对三位党史学家研究作为的及时记载,也是保持党史学科发展连续性的必要记录。

## 二、史家和史著研究的理论价值

史学史的主要目标为探索学科发展趋势与其内在规律,因此,它相当注重

---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5页。

②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视野开阔的宏观研究。但是,若没有对主要史家、史著的精深研究,就不可能获得对整个史学史的确切认知。只有以史学家和党史学著述为重点研究对象,才能抓住史学史课题中最本质的内容,才能生动描画出党史学科的发展路径。

正因为党史学家是演绎党史学史的基本力量,学者们在论及党史学史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考察史家之重要。如周一平认为,史家是党史学史的五大考察重点之一。他将史家定义为有中共历史研究成果的研究者。他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可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也可以研究一个阶段的历史;可以研究某一事件,也可以研究某一人物,某一项工作。只要从事中共党史范围内的研究,有成就的学者,就可以成为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sup>①</sup>

党史学史不仅要考察史家,而且要着重研究其中的大家。因为“在历史学家中,其上乘者要数大家。大家治史,在一个自然历史时段里,能抓住主流,进行全流域考察,其为文也,必着眼于要害环节,条分理析,破疑解难。如此成集,自称系统。其为书也,必有主线,层层展开,面面剖析。为文为书,都以恢复这个时段内的社会构成和社会整体为指归。”<sup>②</sup>简言之,考察大家更易呈现党史学史的发展实况,更能彰显党史学科的整体风貌。当然,强调以著名史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不是否定普通党史研究人员在学科中必不可少的作用。诚如吴于廑所言,“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成就或大或小,都是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链条上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关于这点,不一定每个从事历史学习或研究的人都很清醒地意识到,但是不论怎样,他总是不得受这门学科已有发展的影响,他的先行者的影响。”<sup>③</sup>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学科发展也同此理,正因为有着许多不同层次的研究者共同推动,党史学才有今天的欣欣向荣。因此,在史学史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到精英分子和普通角色的共同

① 周一平:《中共党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 田昌五:《史学与史家——〈史学新论〉之二》,《学术研究》1997年第4期。

③ 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作用,不但要凸显那些能称得上“史家”的杰出者的重要路径,也不应抹杀那些相对无闻的研究者的相关努力。只是,在党史学史起步阶段,必须先通过评述大师来提纲挈领地绘出学科发展的大致轮廓,再通过记载普通研究群体来填充学科的整体面貌。

史著作为史家研究成果的主要体现,自然成为党史学史考察的关键。问题在于史著究竟包括哪些?论文是否可以算作史著呢?学者们对此尚有分歧。如周一平就认为,作为史学史研究对象的史著一般应为史学著作,资料书不是史学史研究的对象。他还强调,“史学著作与史学论文也有区别”,“史学史一般以史学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以史学论文为研究对象。只有那些特别有影响的论文,史学史可以进行附带的研究,可以将史学著作与史学论文进行比较研究。”<sup>①</sup>而张静如则认为:“中共党史学史既然以党史学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为对象,那么,举凡一切与此有关的方面,都应该成为它所研究的内容”,也即主要“研究有关党史方面的各种著述、党的文献对党史学发展的作用”<sup>②</sup>,等等。显然,他对史著的定义不同于前者,他说到的“各种著述”是包括史学著作和史学论文在内的。本人赞同后一说法,也认为史著的范围不宜过窄。只要在党史学中引起过重大反响的著述,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应纳入考察范围。也就是说,仅仅对论文进行附带研究是不够的,也是不公正的。凡是能代表史学史发展方向的作品,都不应被忽视。故本书对三位党史学家的考察,主要以其著作和论文为依据而展开。

以史家和史著为考察的突破口时,还要注意分析的全面性。所谓全面性,是指评述内容要全,要兼顾史家在史学思想、史书编纂、文学风格、研究特色等多方面的路径或影响,又指评价标准要全,应正确评价史家及史著在学界中的历史地位和相关不足,不能顾此失彼。张静如曾详尽地论述了如何在党史学史研究中贯彻全面性原则:应当对各个时期有建树的党史研究者及其著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其贡献,分析其特色,也点明其弱点;对于积累了丰富

<sup>①</sup> 周一平:《中共党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sup>②</sup>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经验的党史学家,除了要分析他们的代表作品外,还要研究他们的治学经验、治学途径,要对他们的生平予以介绍,为之立传<sup>①</sup>。只有在史学史研究中,坚持好全面的原则,不溢美且不掩恶,客观又不失公允,得出的评价才能站得住脚,才有科学性可言。本书的考察,力求严格遵循这一评判标准。

### 三、三人研究路径的代表性

当前开展党史学家研究,应先选取其中的杰出者。杰出的史家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谢荫明在《注重党史研究者自身的研究》中指出:“史家评介的对象应具有权威性,此权威一是指史家要有较高的知名度,能够得到党史界甚或其他学科的认同;二是指学者所代表的学派、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权威性。”<sup>②</sup>分析权威专家的观点和方法,评价他们的成就和路径,能更好地站在学科发展的前列,把握住党史研究的未来趋向。本书以龚育之和彭明、张静如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三者 in 党史学科中都为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党史领域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有如片片红叶,接受了岁月的检阅,依旧闪耀着灼灼光辉。

龚育之,是位居高位的官员,更是极富创见的知名学者。他于1952年9月至1966年月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期间参与起草“科学十四条”、修改“高教六十条”等。70年代,他被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毛泽东选集材料组的工作。1980年1月起,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著作和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并参与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报告等中央重要文件和领导重要讲话。1988年3月至1991年9月,他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理论工作,期间继续参与文献编辑工作,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撰写。1993年,他参与主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1994年3月至1999年3月,他调任中央党校副校

<sup>①</sup>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sup>②</sup> 谢荫明:《注重党史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

长,分管理论工作,1995年6月至1999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着重抓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和上卷的修改等大事,并参与起草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五大报告等文件。1999年以后,他开始成为自由撰稿人,继续深入研究党的思想和战略,参与起草了十六大报告等文件,并担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合著)、《在历史的转折中》、《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论旗走笔》、《龚育之论中共党史》、《龚育之文存》、《党史札记》、《党史札记二集》、《党史札记未编》、《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等。其道德和文章广为人颂,充分展现了一个理论大家的风范。<sup>①</sup>

彭明,杰出的史学名家。1947年,曾与胡华合写《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3年被评为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培养博士生近三十名。他也曾被许多高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名(荣)誉教授等,也曾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等学术职务。他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苏人民友谊简史》、《中苏友谊史》、《五四运动论文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国民史二十讲》(合著)、《五四运动史》、《板凳集》、《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合著)、《彭明文存》,等等。他参编过的史书主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华民国史》、《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纪念毛泽东100周年丛书》等等。他发表了《论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五四运动与20世纪的中国》、《反封建并非反传统》、《谈观点和史料的统一》、《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200余篇论文。他坚毅严谨的治学之道,在学界流传甚广。

张静如,著名中共历史学家。他于1953年被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当资料员。1954年,他被派到北京大学跟随苏联专家学哲学,1956

<sup>①</sup> 参见《龚育之同志生平》,载《怀念龚育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年重回北师大政教系工作。1957年,他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1959年,又与人合作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此后恢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等三百多篇论文;出版了《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中共党史学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静如文存》、《张静如文集》、《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中国共产党通史》等近三十种专著、教材、工具书、丛书等;培养了逾百名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在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几十所高校、军校、党校担任兼职教授;多次参加教育部召开的有关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会议,主持了相关教材编写工作;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点评审等工作;领导了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等。他在党史学界以锐意的开拓创新,而声名远扬,也以党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功绩,而为人所敬仰。

#### 四、学界已有研究的可拓展性

作为党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学界对龚育之和彭明、张静如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一些零散的评述,至今已取得一定成就,但是整体的探索尚未穷尽,还有较大的深化余地。

当前的龚育之研究比较成熟,可以说,在对三者的研究中,它最为完善。这些相对全面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龚育之著作出版时的评介文章。如1992年,施肇域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力作——读龚育之新著〈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2000年,庞松发表了《建树与创新——读〈龚育之论中共党史〉》;2002年,石仲泉刊发了《自由翱翔的硕果——读龚育之的两本新著》;2005年,石仲泉和鲁振祥分别撰写了《理论风格和学术风骨——读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可从中吸取营养引发思考的佳作——读〈党史札记二集〉》;2008年,石仲泉又发表了《读龚育之〈党史札记末集〉》;等等。这些文章,都以龚育之的新著出版为契机,及时介绍了其学术思想的最新发展。另

一类是龚育之离去后的各类追忆性文章。如2007年,林蕴暉的《记龚育之指导党史写作》、赵国江的《从〈党史著述中的十个关系〉看龚育之党史研究的特点》、韩钢的《龚育之与党史研究的三件大事》,2008年陈莉莉撰写了《龚育之对党史人物的回忆与研究》,2009年郭建宁发表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表率——纪念龚育之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龚育之诞辰纪念日分别出版了《怀念龚育之》和《走近龚育之》两本回忆文集,2009年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史代罗和博士研究生陈莉莉分别完成了学位论文《龚育之与中共历史研究》、《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后一博士学位论文,将龚育之的党史研究经历划分为三大阶段,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龚育之的党史研究作为从重要创新观点、理论框架创新、史料挖掘和整理、史实回忆与研究、研究理念和风格五大方面进行了评述。但是,这并不影响本文系统考察龚育之的党史研究路径的意义。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为考察龚育之的党史研究作为,不同评判者的角度、侧重点都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尽相同。

当前的彭明研究亦有较好的基础,但是其在三者研究中显得相对薄弱。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为三类:一类是在彭明生前就对其开展的研究。如1988年,沙健孙发表了《评彭明的〈五四运动史〉》。2000年,岳明君撰写《透视历史的一面镜子——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2002年,岳明君又写有《求实·求是·求索——彭明教授治学生涯述评》,此为彭明研究中的一篇力作,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彭明的史学作为。2004年,《彭明文存》出版,该书的“青蓝情深”部分收录了彭门弟子为庆祝导师八十大寿而作的十来篇评述文章。2006年,陈答才发表了《严谨的导师 宽厚的长辈——我心目中的彭明先生》一文。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对彭明的扛鼎之作、致力领域、学术风范等获得初步认知。另一类是2008年彭明逝去后的相关追忆文章。如2008年,张同新写有《送别彭明教授感慨良多》。2009年,又陆续有悼念文章刊出,如谢荫明的《传道·授业·解惑——追思彭明、马连儒老师》、张静如的《彭明与五四运动史研究》、吴景平的《彭明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和风范》、陈答才的《对彭明老师最后13年的片段回忆》和《为人为学 心中楷模——纪

念彭明先生逝世一周年》,等等。这些文章基本为彭明的朋友、同事、学生等党史学界人士对其学术功绩和为学理念的缅怀。还有一类是对彭明单个研究领域的系统总结。福建师大高峻指导的2009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彭明与五四运动研究述论》即为这类文章。不过,遗憾的是,目前这类研究尚无它文,这显然是与彭明在史学领域的广泛影响所不相符的。应该说,与逾百篇的龚育之研究文章相比,彭明研究还很不足,其中尚有一些空白点有待填补。

目前的张静如研究也开展得较为广泛。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可以划为这样几方面:一是其重要著述出版时的有关评介。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出版时,涌现了一批评介文章,有郭德宏的《深化和改进党史研究的深刻思考——评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王学勤的《马克思主义是党史研究现代化的基石——读张静如教授新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张福记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开拓——读张静如先生的新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等。二是其论文结集出版时的相关集中介绍。如乐群的《从〈张静如自选集〉谈治学态度和方法》、朱文通的《张静如先生对中共党史学研究的贡献浅谈——读〈静如文存〉有感》、郭德宏的《中共历史研究不断创新的一个典范——评〈张静如文集〉》、杨凤城的《学养、思想与现实关怀——读〈张静如文集〉》、姚润田和冯留建的《学界名家眼中的张静如与〈张静如文集〉——〈张静如文集〉出版座谈会侧记》,等等。三是各界人士为庆贺其从教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的系统评述。如在其从教五十周年时,杨世文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法——纪念张静如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的50周年》;程美东撰写了《张静如与现代化理论研究》;吴汉全刊发了《张静如与中国的李大钊研究——写在张生先七十华诞之际》;《张静如学术与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更是收录了“党史基础理论研究”、“党史各时期研究”、“党史人物研究”、“党史与中国社会史研究”、“党史研究生教育”、“党史学术队伍建设”六方面内容的30篇评析文章。在张静如从教六十周年之际,王跃和王炳林等主编了《张静如学术思想研究》,从党史人物、理论、思想研究等六个方面总结了张静如的党史研究作为,而《学术与人格的魅力:我们眼中的张静如先生》则收录了多篇党史学界专家和新秀对张静如治学为人、待物处世的

真切感悟。另外,结合当时张静如《暮年忆往》的出版,一些学者对其人生历程和学术思想作了点评,如《人有多真,学有多深:张静如〈暮年忆往〉读后》、《阅读是一种游历:读张静如先生的〈暮年忆往〉》等文。四是其他的一些散论。如1993年,朱志敏与王伟民合写的《张静如与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于文善发表的《张静如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研究简评》、2007年汪兵撰写的《中共党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评述及研究展望》等等。但是通观这些文章,仅《张静如与中共党史研究》系统总结了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前之于党史学的作为。由于张静如生前笔耕不辍,成果丰硕,这一整体评述难免不够系统,其他数十篇文章则主要是侧重某一方面来进行梳理,都不具有全面性。

## 五、比较研究法的启发性

比较研究法是史学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考察方法。史学比较研究法,是指对历史上的事物或概念,包括事件、人物、思潮和学派等等,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对照,判明其异同,分析其缘由,从而寻求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一种方法。<sup>①</sup>作为一种宏观考察法,比较研究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进行的综合考察,有助于克服孤立地研究单个对象而导致的狭隘性。比较研究法不仅能从共同性中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从差异性中阐明矛盾的特殊性,而且能透过表面的异同现象,在“如何发生”的基础上探究出“为何发生”,使对历史人物或现象的解释更为深入。

在比较研究的视角下,身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学盛世的当代史家,普遍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也呈现出某些个性特征。共同的东西往往显而易见,如不同的史家也许有着相近的生活阅历、学术师承,可能有着邻近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内容,甚至提出了一些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观点,又都无怨无悔地献身学术、探求真理,等等。个性特征也不难查找,“在共有的素质之外,党史研究者的学术风格各异。有的擅于搜集史料,有的擅于理论分析;有的专注微观探索,有的擅长宏观的把握;有的表述严谨,有的笔调激昂;有的涉猎多门,有

<sup>①</sup> 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的专攻一科……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各自的风范,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sup>①</sup>但是,这些共性和差别只有在比较的前提下才能生动、具体。正所谓“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sup>②</sup>,史家研究也不例外,在与其它学者全方位的比较、对照中,学者们身上的共性更能显露无疑,特性也就清晰可见。

论述龚育之和彭明、张静如党史研究路径,即是对比较研究法的一种运用和尝试。三位史家同为京城知名学者,建树悬殊不太大,科研条件也几近相同,完全符合比较研究的统一性前提。他们致力的重点领域不一样,个人风格又不完全雷同,也符合比较研究的差异性条件。所以说,对龚育之和彭明、张静如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他们治史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这种考察的教育性也就比较显著,有利于真正“叩开鲁班的大门”,解密大家的为学之道,使后辈获取学识和经验的双重教益。

国学大师季羨林曾说:学术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时会有崇山峻岭出现,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余地,“就这样,大师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永远有问题,永远有大师,每一个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一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这一些丰碑就代表着学术的进步,是学术发展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sup>③</sup>龚育之和彭明、张静如的卓越探索,堪称党史学中的三座“丰碑”。论述三位学者的主要研究路径,实际上是以他们各自的作为为标注,描画党史学的重要转折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党史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和主要脉络。这种总结,对于党史学科的年轻人更好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举目远眺意义甚大。

① 谢荫明:《注重党史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

② 【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0页。

③ 季羨林:《学术大师不能超越——由〈汤用彤全集〉出版引发的思考》,《北京日报》2003年3月11日。



## 第一章 龚育之的中共历史研究路径

任何活着的人,都从不同角度参与历史的创造,并对历史发展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研究中共历史的人,则具有两重身份,既参与了一个阶段的历史创造,又对自己没有赶上的和参与过的历史进行研究。龚育之就属于这一种人。但他又与众多的中共历史研究者不同,后者只是群体性参与历史的创造,与高层社会管理者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而龚育之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高层社会管理者创造历史的过程。研究龚育之对中共历史学的贡献,必须排除掉他对创造历史的贡献,否则,混为一谈,事情就弄乱了。比如,他参加了中共十二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应该说是做贡献的,但这种贡献是属于参与创造历史的贡献,而不是对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当然,在考察龚育之对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时,也一定要注意到他所参与的历史创造过程给他的研究提供的有利条件。只有明确这一研究原则,才能在概括龚育之的学术贡献之时,准确刻画其研究路径和方法。

### 第一节 分析和存留重要史料

诚如龚育之自己所言,皆因历史机缘,他曾屡经运动风暴,数次卷入政治漩涡,虽沉船没顶,却近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这些事件的因果始末,故有责任心不溢美不饰非,追忆相关故人旧事留与后人评说;“文化大革命”后,他也应邀参与起草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期间的多次中央全会文件与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深谙某些决议、决策产生的前前后后,故能科学地解读会议精神,准确地向民众传达鲜为外人所知的起草概况,字里行间总跳跃着些许